

## 伊安·霍德 (Ian Hodder) 教授访谈录\*

【英】伊安·霍德 (Ian Hodder)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

刘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 (采访、整理、翻译)

杨旭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翻译、修改、校对)

采访者按：伊安·霍德 (Ian Hodder)，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西方后过程考古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恰塔尔胡尤克 (Çatalhöyük) 遗址、欧洲史前史、物质文化、社会与文化的长时段变化。在斯坦福大学开设的课程有“考古学理论导论” (研究生课程)、“物：人与物关系的考古学” (研究生课程)、“恰塔尔胡尤克与新石器时代考古” (本科生课程)。



1968年至1971年，霍德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攻读史前考古方向并获得学士学位。

1971年至1975年，霍德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考古学中的空间分析”。

1974年至1977年，任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考古系讲师。1977年至1999年，在剑桥大学任教，先后任助理讲师和讲师 (1981年)、史前学研究副教授 (1990年)、考古系教授 (1996-1999年)。1999年至今，任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99年至2009年，任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联合主任与主任。从2002年起，任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唐勒维家族 (Dunlevie Family) 教授。

1971年，霍德荣获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戈登·柴尔德奖 (Gordon Childe Prize)。1990年至2001年，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士 (Fellow of Darwin College, Cambridge)。1995年，获瑞典古物学会 (Swedish Society of Antiquaries) 颁发的奥斯卡·蒙特留斯 (Oscar Montelius) 勋章。1996年至今，任英国科学院院士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2002年，因其对土耳其考古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霍德荣获土耳其文化部颁发的国家奖。2005年至2006年，任古根海姆院士 (Guggenheim Fellow)。2007年至今，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荣誉教授。2009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 (Bristol) 大学自然科学荣誉博士。同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德雷克赛尔奖章 (Drexel Medal) 以及伦敦皇家人类学学会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颁发的赫胥黎纪念勋章 (Huxley Memorial Medal)。2011年获得荷兰莱顿大学 (University of Leiden) 荣誉博士学位。

在1974年至1976年、1980年至1981年、1982年至1983年，前后三次对肯尼亚的物质文化进行民族学调查。1981-1990年，主持英格兰汉敦汉姆遗址 (Haddenham) 的发掘。1993年至今，主持土耳其中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发掘，在发掘中使用了反身 (reflexive) 的方法，成为后过程考古学方法的范例。

主要著作有：《考古学中的空间分析》 (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Hodder and Orton 1976)、《象征符号实践：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Symbols in Actio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Material Culture, Hodder 1982)、《现存的过去：给考古学家的人类学导论》 (The Present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s, Hodder 1982)、《阅读过去：

\*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资助编号 201404920022。

考古学阐释的主要方法》(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Hodder and Hutson 1986、1991、2003)、《欧洲的驯化: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偶然性》(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 Structure and Contingency in Neolithic Societies, Hodder 1990)、《考古学的过程:导论》(The Archaeological Process: An Introduction, Hodder 1999)、《豹的故事:揭示恰塔尔胡尤克的秘密》(The Leopard'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 Catalhöyük, Hodder 2006)、《纠缠:人与物关系的考古学》(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ings, Hodder 2012)。

采访者于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作为一名国家公派访问学生在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交流访学。这期间,采访者有幸旁听了霍德教授的“考古学理论导论”、“物:人与物关系的考古学”、“恰塔尔胡尤克与新石器时代考古”三门课程。在所有课程结束后,采访者于2015年6月9日中午在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就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霍德教授的个人经历、对过程考古学的看法、与宾福德之间的关系、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及中西考古学的走向等问题,对霍德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由于采访时间有限,事先设计的问题没有全部完成,故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采访者与霍德教授的访谈内容,下篇为霍德教授对未完成问题的书面回复。

## 上篇

刘岩:霍德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在这次访谈中我想跟您谈谈您有关后过程考古学的观点、您个人的一些理论思考以及您个人的一些学术经历。我想,通过这次对话,能够让中国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您的思想。在中国,考古学界一般是通过您的著作《阅读过去》(Hodder and Hutson 2003)以及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的著作《考古学思想史》(Trigger 2006)了解到您的。虽然您的著作《阅读过去》已经有了中译本,但大部分中国学者仅仅通过一、两本书还不能够完全透彻理解您的思想。而且在中国,后过程考古学也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所以,我们就首先以后过程考古学来开始我们的访谈吧。

伊安:好的。

### 第一部分 后过程考古学与人类观念的作用

刘岩:我了解到,在《阅读过去》一书的第一版(Hodder and Hutson 1986)出版的时候,后过程考古学的影响力还很有限。而在1970年代,您当时还是过程考古学家,主要兴趣点是运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去发现考古遗存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那么,为什么您会提

出后过程考古学呢?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对过程考古学进行批判呢?这是否与您在《象征符号实践》(Symbols in Action, Hodder 1982a)一书中提到的、您之前所做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有关呢?

伊安:我提出后过程考古学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当我用过程考古学方法进行空间分析时,我发现,分析结果难以令人满意,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进程所留下的考古遗存往往会呈现相同的空间分布模式(Hodder and Orton 1976)。所以,当你去观察这些分布模式时,你会发现,它们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实际上,这些模式是由不同的社会进程产生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过程,你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情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倡导情境分析法(contextual analysis),这同我对过程考古学的批判、对空间分析背后的社会过程所做的缜密思考密切相关。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正如你所说,我在《象征符号实践》(Hodder 1982a)中提到过的民族学研究对我影响很大,是这个研究让我意识到,人类行为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联往往并不简单,原因在于这一关联受到意义与能动性(agency)的作用。与此同时,跨文化比较的过程考古学方法是有问题的,它不足以让人理解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也就无法让人

真正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

第三,在1980年代的美国考古学中,当时欧美考古学家所坚持的进化论视角的人类学已经被人类学家所摒弃。很多人类学家已经抛弃了实证主义,并开始运用社会学理论。这些社会学理论受到法国及英美理论家的影响,倡导一种更为情境化的(contextual)、历史化的方法,对语言和意义尤为感兴趣。所以,想借此大展身手的生态的、环境的进化论思想,同已经走向另一方向的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认为,试图让考古学同人类学重新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考古学中采用的是一种被误解了的实证主义观点,人们误以为科学是保持中立的,是客观的。而与此同时,发生了很多政治运动,如性别与女权主义的研究,又如各地本土的土著群体,他们都认为仅有科学方法是不够的。他们都存在着身份认同上的问题,对权利和表征(representation)非常关注。很明显的是,考古学家在谈论过去的女性时也存在很大的偏见。所以,考古学家需要对世界各地不同群体的利益作出更为积极的回应。考古学需要一种更为反身的(reflexive)、更具历史的、更具自我批判的方法。

刘岩:从您《象征与结构考古学》(*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Hodder 1982b)一书中,我了解到,当您在剑桥大学任教时,您身边有很多杰出的学生,你们在一起探讨新的理论,一起批判过程考古学(如图1)。这让我想起在过程考古学的早期,宾福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他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学生(Binford and Renfrew 1987),并且这些学生对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想您的学生也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后过程考古学的先驱者。我的问题是,你们当时都在讨论些什么?您从您的学生中和这些讨论中都学到了什么?

伊安:当时的确有很多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在《象征与结构考古学》(Hodder 1982b)一书和另一本名为《意识形态、权力与史前



图1:霍德教授1980年代中叶在剑桥大学(来源:霍德教授提供)

史》(*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Miller and Tilley 1984)的书中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些学生有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sup>1</sup>、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sup>2</sup>、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ey)<sup>3</sup>、亨利艾娜·摩尔(Henrietta Moore)<sup>4</sup>、麦克·帕克·皮尔逊(Mike Parker Pearson)<sup>5</sup>等等。当时有很多很多学生,他们都才华出众;是他们引领我走向了后过程考古学,而不是在其他领域徘徊。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中有些人接受过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但不是美国人类学;他们接受的是更关注历史的、更关注能动性及意义的新人类学。影响我们的主要人物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sup>6</sup>,因为他对当时的人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sup>7</sup>当时也在剑桥大学任教;我有几个学生,如麦克·帕克·皮尔逊,开始关注吉登斯,而且吉登斯也过来同大家交流学术。所以,我们同人类学关系密切。吉登斯是一位社会学家,这样,我们的理论框架就更加广博。但也有其他一些人,如埃德温·阿登纳(Edwin Ardener)<sup>8</sup>也和我们进行了交流。不知我是否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并且让你对那些学生和他们所阅读的材料有了大致了解?

刘岩:是的。你们从谈话中都学习到了什

么?

伊安:我们主要获知了有关能动性的概念,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还有对结构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有关语言、文本、意义及围绕后结构主义的争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sup>9</sup>也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我的学生们对很多颇具启发性的思想都很感兴趣。

刘岩:从您《阅读过去》(Hodder and Hutson 2003)一书中,我了解到,物质文化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由意义所构建的。本质上来说,人的观念是物质文化的根源,并决定着物质文化的意义。您认为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吗?您对功能与适应在决定器物的形制和风格上所起的作用怎么看?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是实用主义的,即所有的东西都与实际的行为效率有关,您认为这样的社会存在吗?换言之,您对形制、功能和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伊安:这是个大问题。正如你所说,在考古学中,人们对风格的作用以及风格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争议并不是很有帮助,因为像形制或风格这样的概念是描述性的,是从外部视角对器物所进行的描述。如果人们对社会实践更感兴趣,他会更关注能动性理论,能动性涉及到了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去制作器物。我认为,区分风格与功能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区分也没有任何益处。这是因为,所有的风格中都有功能,而且所有的功能中都带有风格。两者的区别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分不清楚在物质材料中,与社会有关的功能及与适应有关的功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两者往往是一回事。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风格中的某些东西与功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以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并且你也对能动性有兴趣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风格的所有层面都是有功能的。我认为,说某件东西只有象征含义实际上是对社会过程的一

种误解。所以,对我来说,从实践理论和能动性性的角度来讲,区分风格与功能已经不合时宜(no longer relevant)了。

刘岩:您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都会受到人类观念的影响吗?

伊安:是的。但自1980至1990年代以来,我们需要对有关意义的观点格外小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许多人类赋予实物或行为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有主动、有意(conscious)去赋予的意义,而是体现的(embodied)、发生在实践过程之中的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本体论思考,他们赋予这个世界的意义也不同。所以,在某些存在万物有灵观念的社会中,人们认为,实物和动物可以起到人的作用。所以,人赋予物以意义的方式有很多,对意义的知觉也有不同的层次。人们已经对将物质文化当成文本看待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物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很多意义都与实践相关。所以,在我看来,将过去看做可以解读的文本已经没有太多的益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能动性总是有意义的这一观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刘岩:我发现,“体现(embodied)”一词在您的书中多次出现。您能阐释一下这一词的含义吗?

伊安:好的。我以皮埃尔·布迪厄讨论北非的卡拜尔(Kabyle)社会为例进行说明。在卡拜尔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男人应该像长矛一样昂首挺胸。当地的人们觉得,昂首挺胸是一种优良品质,是正直的象征,是群体中优秀成员的表现。然而,人们却认为女人不应该直视他人,应该把腰弯下,低头向下看。这就是意义可以被体现的一个典型例子。要想成为一个男人,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个正直的男人,你必须挺直腰杆。但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卑躬屈膝(deferential),应该同男人在行为上有所区别,应该低头向下看。这样,意义和社会等级差异就在人的

身体上体现了。

刘岩:所以,“体现”的意思是,身体可以作为一种载体来表达社会规则,亦或是说,关于社会中那些规范身体应该如何行动的社会规则以及其背后的社会观念,作为载体的身体是可以表达出这些内容的,对吗?

伊安:是的,你说的很对。举例来说,我们此时正在谈话,你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可以直接对视着彼此。但是,在中世纪的一些社会中,如果你过来和我说话,是不可以直视我的眼睛的。你应当低头看地面,不能抬头看我。另外,在一些社会中,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卡拜尔社会,女人是不得与他人有目光交流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着我的眼睛跟我交流,这一行为本身就表达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观念,即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可以平等地同对方交谈。

刘岩:如果考古材料非常的有限,或者我们没有发现图像、圣象、雕塑等特殊遗存,我们是否有可能了解到某一史前社会的意识形态呢?在这种情况下做研究,我想,对史前考古学家们来说太难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遗址都像恰塔尔胡尤克那样,可以发现如此之多的象征符号信息。可我想,民族考古学或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些许帮助。但是,您在《现存的过去》(*The Present Past*, Hodder 1982c)一书中,表达了对类比方法的一些担心,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发现史前社会的更多社会背景?

伊安:类比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现存的过去》(Hodder 1982c)一书中,我想要说明的是,应该有一种更具关联性的类比(*relational analogy*)方法,换言之,类比方法与周围的环境和背景(*context*)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有许多例证表明很多考古学家过于简单随意地使用类比方法,他们并没有认真仔细思考自己所使用的类比例子是否能彼此相关联。

与此同时,我仍然认为,当我们所拥有

的材料越丰富的时候,我们越能有效地使用类比方法。如果我们发掘的遗址里除了一些石器之外,其它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就很难研究清楚遗址的背景。但考古学家总是非常善于从贫乏的材料中提取更丰富的、详细的信息。举例来说,近年来,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考古遗传学、古DNA、同位素、新的测年技术、对石器和陶器上的残留物进行分析,所有这些方法都表明,我们现在有能力从材料贫乏的遗址中获取种类更为丰富的信息以及更为多重的证据线索。但是,据我所知,在中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材料的丰富程度堪称惊人。所以你们更有能力去重建古代的社会背景信息,因为你们拥有更为丰富的材料数据,拥有连续性非常强的文化历史,并且拥有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文献资料可以研究。所以,通过以上的这些方法,我想我们应该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更富有关联性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试着将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材料组织起来。但我们还是需要类比的方法的,这不仅仅是假设古今存在着连续性,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在与其他社会相比较的过程中,发现那些其它的视角是否是相互关联的。

刘岩:那么,您认为后过程考古学批判的是过程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而没有批判其方法吗?

伊安:不是的,后过程考古学也批评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过程考古学很关注普遍规律(*over generalization*),在美国,有很多人,包括学生,他们跑到一个考古遗址,仅仅通过采样的方式挖了一点点材料,就想以此来验证假说。我认为,这种做法很糟糕,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考古遗址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到遗址在不同地层深度上的差异性,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种类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等等。我非常反对这种偏重采样和验证假说的考古学方法。我想,我们需要一种更关注情境的、更具批判性精神来审视材料来源问题的考古学方法,这一点我在前面就已经提到了,那就是要审视那些用来研究的考

古材料产生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会去理解考古材料的情境,即我们从什么地方、在哪里得到了这些材料样品。我坚定地认为,一个更加注重情境的考古学方法能够指导大型考古队进行更加细腻的、发掘时间更长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我真的觉得,这样要比人员稀少的小型考古队到遗址上挖那么一点材料要好得多。

刘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发掘了20多年。

伊安: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把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挖得太快,将会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梅拉特(Mellaart)1960年代对恰塔尔胡尤克的发掘就是如此。他发掘得非常快,只发掘了很短的时间。当然,他得到了一些正确的结果,但他把很多东西都给搞错了。

刘岩:马修·约翰逊(Mathew Johnson)曾说,并没有“后过程考古学家”这一说法,他还列举了后过程考古学的8种观点(Johnson 1999)。布鲁斯·特里格(Trigger 2006)则将后过程考古学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对过程考古学的批判阶段、结构主义考古学阶段和基于现象学方法的景观考古阶段。我们知道,后过程考古学是非常多元的,那您是怎样概括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的理论趋势的呢?

伊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过程考古学非常非常多元。当然,后过程考古学可以简单概括为:一种将社会理论引入到考古学中的考古学。尽管社会理论本身已经非常多样并且非常难概括,但是仍可以对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点归纳:关于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转变,我前面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从早期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到开始关注文本,进而转向对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以及转向对物的参与(engagement with things),如体现(embodiment)和景观(landscape)的关注。所以后过程考古学

存在明显的转向,那就是从对作为语言的意义关注,转到对现实生活世界(lived world)中的意义和一切存在(being)的关注。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明朗的趋势,但是当代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还有很多。我觉得目前很难确切说清楚谁是后过程考古学家,谁是过程考古学家,因为二者的理论界线非常的模糊不清。举例来说,各种各样拥有着不同研究兴趣的人群都开始使用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方法。过程考古学家们也尝试着吸收能动性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不同的人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着物质性(Knappett 2012)。对各种考古学派的考古学家而言,对自身所属的学派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刘岩:那么,对意义和文本的关注是后过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的特征对吗?

伊安:是的。后过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有时还被称为阐释考古学(interpretive archaeology)。

刘岩:我们来谈一谈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论吧。我知道,最基本的方法是反身(reflexive)的方法。您能简要介绍下这个方法吗?这个方法是如何发展来的?在您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之前就有这一方法了吗?

伊安:并不是这样的。这一方法是在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在发掘的过程中我尝试着开发这个方法。我这么做的原因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的,虽然人们已经转向了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但却仍然用着过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过程考古学的方法是一种非常客观主义的方法,对我来讲,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所以看起来有必要发展一些对理论变化更为敏感的方法。考古学中反身方法是受到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反身方法的影响。所以,这一方法不仅仅是从考古学内部发展出来的。反身的方法中有一些关键性的思想极为重要。其中主要的思想是,人们应该对科学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进行反思。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一些人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使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就像男性会以一个男性的视角来书写历史,而殖民地考古学家则会以殖民地的视角来书写过去。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表明,人们没有对科学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反思。所以,这就是反身考古学中最重要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或者说成是两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点,我将之称为“手铲边缘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t the trowel's edge)或“手铲边缘的阐释”(interpretation at the trowel's edge)。在实证主义或过程主义的框架下,人们过去常常认为,考古材料的收集仅仅是一个机械的、描述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你只需要描述自己见了什么。但事实上,大部分考古学家都知道,当我们在发掘时,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发掘过程的本身往往包涵着很多非常复杂的情况需要我们去解释。因此,试图在发掘的同时就尽可能多地发现各种信息、尽可能多地进行各种阐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考古发掘的本身具有破坏性,我们永远无法再回到已经发掘过的层位与遗址中对某些遗存进行核对。所以,我们再也无法对遗存进行全面的再阐释,因为那些与之相关的背景信息已经不见了。所以,你所能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我们进行发掘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及做更多的记录。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在手铲边缘)记录的信息越多,后人所能做的各种不同的阐释也就越多。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将其称为“对记录过程的记录”。通常情况下,考古学家仅仅会记录那些他们发现的遗存,但是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为何这样记录,以及当他们在做记录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层面的记录,用来解释或告诉大家记录者在做记录时的内心想法。举例来说,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考古人员会以表格的形式做最初层面的记录,但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会把每天挖掘过程以及所想记在田野日记中,我们甚至还会拍摄一些考古人员在挖掘、思考或者做记录时的录像。

所以,这些信息都提供给我们除了那些基本记录形式之外的另一种层面的记录方式<sup>10</sup>。

刘岩:近些年来,还有哪些后过程考古学的具体方法被发展出来或被成功应用了吗?

伊安:最近,我们刚刚完成一部名为《拼装恰塔尔胡尤克》(*Assembling Çatalhöyük*, Hodder and Marciniak 2015)的书。“拼装”(assembling)的思想相当有趣。这个思想同样是来自社会科学、人类学及其它学科。但它与考古学中组合(assembly)的思想能够产生相当多的共鸣。考古学家可以利用不同种类的考古材料,像陶器材料、石器材料、动物骨骼材料、植物材料等。在恰塔尔胡尤克,我们共收集了35种不同的材料,有土壤材料、化学分析材料、残留物分析材料、植硅石材料等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材料整合在一起了。在很多考古项目中,人们不大强调对材料的整合。人们只是将不同种类的材料送到相关的专家那里,然后由专家们各自将自己所做的分析写成单独的分析报告。但是,我真正想要做的,是让所有人把手中的材料拼装整合在一起,从而真正地形成一个团队。所以,作为一个团队,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就需要相互协作,并且需要与团队里的所有人进行对话。这样,考古队中的每个人都会试图沿着特定的方向来处理材料。然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依赖网络关系的社会过程。同时,网络关系的思想也非常有意思。以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为例,不同的群体喜欢彼此在一起工作。当某一群人头脑中产生某种灵感时,他们就会尝试将不同种类的材料放一起来构建自己的观点。但在另一群人、另一个网络关系里面,大家说,我们不喜欢那样的观点,那他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使用证据。他们会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拼装证据。这和乐高玩具非常相似,你知道的,乐高是一种儿童玩具。在玩乐高玩具时,你有很多块积木砖,但你却可以用相同的积木砖拼装出来不同的雕塑或不同的物体。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不同的考古队也是这样,他们手中所拥有的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是相同的、可以

共享的数据库,采访者注),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相同的材料拼装在一起。

刘岩:所以,拼装的思想就是将不同类型的材料与证据放在一起、用不同的方法组装整合,目的是想看看这些材料以这种方式组合会为我们呈现出什么样的知识和信息?

伊安:是的。但关键之处在于每个人手中拥有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平等共享。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拼装在一起。

刘岩:所以,不同的人用相同的材料拼装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是吗?

伊安:是的。但是关键在于要用不同的拼装方法。

刘岩:那么,人们在拼装材料前不能有任何的想法或假说吗?

伊安:人们可以有。人们可以事先有假说,你可以说他们在检验假说。但我不认为拼装是一种检验假说的行为。与其说拼装是一种检验,不如说拼装更是一种.....

刘岩:更是一种归纳?

伊安:是的,拼装是一种归纳,但要更进一步.....它是一种社会过程,人们彼此交流,也可以相互竞争,然后产生不同的想法。我想,将拼装看成是一种客观的、对科学假说的检验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拼装更像是一种很多人参与的社会过程。

刘岩:拼装这一概念让我想起了拉图尔(Latour)的书《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Latour 1986)。书中,拉图尔在实验室里面观察并记录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相比较,考古学家也是知识的生

产者,但拼装的过程与实验室中的科学过程是不同的。

伊安:是的,你说的很对。

刘岩: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拼装的这个过程,反映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学者,在产生知识过程中是有能动性的;所以,知识本身是带有人的意志和观念的,知识本身也包含了人在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参与过程。而且,从能动性与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知识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客观与实证,从本质上讲,知识是一种社会的、经验性的实践产物。

伊安:是的,就是这样。

刘岩:让我们来聊一聊理论与方法的关系吧。看上去,在后过程考古学中,理论要比方法先出现,您赞同这一观点吗?在实践中,您是如何针对某一具体的理论去发展后过程考古的方法的呢?我的意思是,反身的方法是在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之后出现的,那您是如何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某一理论去探索与之相关的方法的呢?

伊安:这与过程考古学很相似,首先是进行理论的争论,之后发展出了中程理论,中程理论更侧重方法层面。我想你也可以认为这对后过程考古学来说同样是成立的,即后过程考古学刚开始非常理论化,之后则更加侧重方法。

刘岩:是的,我也有这样感觉。

伊安:我也不知道理论和方法是不是总是这样。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刘岩:是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根据某种理论思考来发展具体的方法的,您如何将您的理论付诸实践?



伊安:在我看来,考古学家们实际在做的,同过程考古学所倡导的发现普遍规律与机制的方法是分离的,就过程考古学的思想而言,它倡导的是首先提出假说,然后用材料加以检验。在实践中,这样的方法就是在获取规律性的知识。但这种获取规律性知识的方法同样受到当时日渐兴盛的合同考古(contract archaeology)的影响,即在发掘中所使用的方法要尽可能地快捷、高效。所以,对我而言,那些自认为存在着某种客观的、不受社会过程影响的方法,同所有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之间是有这很大差别的。我的意思是,倘若你接受了科学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这个观点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这样的观点就不会出现在过程考古学的方法中了。所以,对我而言,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考古学方法更具社会性、更具批判性、更以社会为基础。而我们所发展出的新方法正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我们同样受到了具有科学实践性的民族志,以及社会科学的影响。因此,我想要回答你的是,你应该努力做到让你的理论与方法保持一致。你必须确保你所使用的方法不与你的理论观点相矛盾。

刘岩:您能概括一下后过程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吗?您觉得哪项成就最为重要?

伊安:对我而言,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让考古学多与社会相联系(socially relevant)、多参与到社会现实问题中(socially engaged)。我发现当人们与我交谈时,他们经常对我说,他们发现这个方面是最有价值的。他们想让考古学多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多多参与到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如今,不论你在谈论性别考古、女权主义考古,或是谈论后殖民地(postcolonial)、本土考古(indigenous archaeology),还是谈论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multivocality),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社群考古(community

archaeology)中来,也会有更多的团体和社群参与进来。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进步都是最珍贵的。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进步都是受到了后过程考古学的影响。但我坚信,后过程考古学的确对这些进步是有所帮助和推动的,即便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促成了这些进步。例如,美国的社群考古就受到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原住民运动的强烈影响。但后过程考古和本土考古融合得很好。所以,对我来说,这一进步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反身的方法同样也很重要,尽管它并没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样有影响力。我想,这是由于合同考古自身带来的巨大局限性,以及考古学自身的财政问题等因素造成的。但反身的方法还是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的,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其他几位学者最近在《古物》(Antiquit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向大家展示了反身的方法如何同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Berggren et al. 2015)。

刘岩:是有关3D技术的那篇吗?

伊安:是的,3D还有一些其它的技术。那篇文章是讲人们是如何在田野考古中应用平板电脑等技术,进而如何真正在手铲边缘对材料进行阐释。

刘岩:后过程考古还有其它的成就吗?

伊安:在我看来,当代考古学所探讨的问题范围更广阔了,思想和理论的视野也更宽广。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些视野更为广阔的探讨让考古学家们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讨论中。举例来说,在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系,正是因为后过程考古学的存在,才让系里的考古学家同文化人类学家相处融洽,才让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对话、相互了解。在这里,文化人类学同考古学关注的很多问题是一样的,如权力与能动性、意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物质性、文化遗产。所以对我来说,考古学能够在社会科学中这些视野更为宽广的问

题讨论中作出一些贡献,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

刘岩:在您眼中,后过程考古学有哪些不足之处吗?换句话说,您对后过程考古学还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伊安:我想,我最主要的担忧可能还是来自反身的、情境的方法与同相对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很多人都看到了一种危机,那就是考古学似乎变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任何他们想编造的故事的场所。我自己也对英国考古学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持非常批评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在英国考古学中,人们似乎可以不加批判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到材料之上,而并不去思考究竟自己的观点是否适合自己手里的材料。并且,在某些方面,考古学同相对主义之间产生了一种轻浮的、未经认真考虑的暧昧关系(flirtation),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似乎什么都可以不被控制地发生,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他们想说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考古学的阐释非常容易受到权力的操控——受到那些对过去的阐释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的操控。这种不加批判的相对主义方法让人们在后过程考古学产生了抵触,人们会觉得后过程考古学是缺少科学性的,等等。我已经尽力地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发掘中让大家知道,你可以持后过程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可以是很科学的。在我看来,并不是后过程考古学排斥科学。实际上,我非常希望通过参与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而让后过程考古学更加科学。然而,由于人们认为后过程考古学并不科学,所以非常多的关于后过程考古学的负面反应已经产生了。这一点以美国考古学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考古学中,分析哲学的视角更浓,而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美国考古学已经脱离了文化人类学的主流趋势。

刘岩:您认为未来会出现后-后过程考古学吗?您认为这种新的范式会是什么样的?从考古学史来看,考古学理论似乎总是在科

学与人文、物质与思维、自然与文化、社会与个人之间来回摇摆。您认为未来的新范式会再次侧重功能主义吗?

伊安:我真的觉得现如今有关过程与后过程的争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激烈了。我的意思是,在1990年代或2000年代早期,人们对此还会争执不休。但现在不会这样了,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后过程主义者还是过程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能发现,在现如今,受社会学理论影响的考古学家同受新达尔文主义等生物学理论影响的考古学家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那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或新进化论主义者可能不会说自己是过程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立场中带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因素,这跟过程主义非常相似。而那些研究文化遗产、冲突过后的调节(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以及能动性的学者们也不会称自己为后过程主义者,但是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科学非常感兴趣。所以你可以继续保留以前的划分,但是人们可能不会再使用这些曾经的称谓词汇了。我想,一种十分确定的情况是,当下的美国考古学又重新回归到了一种更倾向自然科学的状态,人文色彩越来越淡了,并且强烈地受到了生物学、新进化论、进化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理论的影响,或许欧洲考古学也是这样。所以,在我看来考古学很明显从人文、社会科学阵营中又回到了自然科学的阵营中。

刘岩:所以,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之间的界线较以前更为模糊了,对吗?

伊安: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但你仍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

## 第二部分:个人经历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

刘岩: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是有关与您的个人经历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从巴尔特(Balter)《女神与公牛》(*The Goddess and*

*the Bull*) (Balzer 2005) 一书中, 我了解到, 您在少年时期曾有一段在新加坡的经历。那么, 东方的文化曾经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吗? 如果有, 东方文化对您的学术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后过程考古学中的一些思想, 如拒绝主、客观的对立, 这跟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十分相似, 尽管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强调天的作用, 对人的能动性很少提及, 但二者其实都是与笛卡尔的二元论相对立的。

伊安: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还很小。由于太年幼, 所以中国思想和文化还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那段在新加坡的日子给我留下了十分快乐的回忆。我记得我在那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我还记得那些极其美妙的节日, 尤其是水上的龙舟, 还有绚丽的烟火, 太美了。我当时只是很热爱这种文化, 这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化。那段记忆非常美好。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经常去东亚看看, 因为在世界的版图中, 我热爱那片土地。但学术上所受影响是在我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发生的。当我在英国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我阅读了一些与佛教和印度教相关的书籍。你知道, 其实很多西方学者在学术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影响。

刘岩: 是啊。所以后过程考古学的思想应该可以在中国更容易被接受。但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由于政治、考古学发展上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的政治经济进程等因素, 所有这些都让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上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人们往往对逻辑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以及西方的考古学思想难以接受。

但事实上, 东、西方思想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比如, 有很多学者认为美国 19 世纪文学和哲学中的超验主义思想似乎就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 Thoreau 1910) 是一部超验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隐居湖畔, 与大自然为邻。这部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等思想与中国

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他的作品似乎透露出一些东方式的哲思。此外, 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了摆脱笛卡尔的二元论——这个现代性思想的根源, 也曾经尝试吸收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些因素<sup>11</sup>。哲学家海德格尔开始试图从东方哲学中寻找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法。总之, 我认为, 后过程考古学就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 因而在后过程考古学中是应该可以看到某些中国哲学的身影的。

自从 19 世纪晚期以来, 中国一直在试图学习西方、尝试从西方的思想中寻找出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钥匙,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被贬低了。尽管中国考古学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生存, 但它还是有保守的一面。当然, 这也许是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 但纵观历史, 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在西方的极大影响下成长的。所以, 或许中国考古学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就是将中、西方思想结合起来, 去探索人与物的本质。也或许, 这应该是中西方考古学都应该去努力探寻的一条路。

伊安: 是的, 你说的这些都很对。在我看来, 中国考古学可以通过探索中国的哲学与思想, 发展出一个受到中国思想而不是西方思想影响的考古学, 以此对世界考古学作出重要的贡献。若是这样, 那将会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我非常期待去见证这个时刻。

刘岩: 在考古学和哲学上, 您分别都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

伊安: 当我在伦敦读书时, 戈登·柴尔德 (Gordon Childe) 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一直觉得他是 20 世纪最最伟大的考古学家, 我在很多不同的方面都非常钦佩他。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接受的都是柴尔德式的考古训练, 尽管与之相矛盾的是, 我那时也受到了罗宾·柯林伍德 (Robin Collingwood)<sup>12</sup> 的很大影响。接下来, 我在剑桥读书时, 大卫·克拉克 (David Clark) 对我的影响很大, 除此

之外,我还受到了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 Clark)等人的影响。在这之后,布鲁斯·特里格对我影响非常大。影响我的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还有他总是乐于另辟蹊径的做事方法。他并不只是说别人说过的话,而且他总是在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在强调人类学的重要性。他同样受到柴尔德的巨大影响。

刘岩:您认为一个学者的性格会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吗?因为路易斯·宾福德给大家的印象是他很喜欢与人争论(Binford and Renfrew 1987; Binford 2002; Binford and Sabloff 1998; O'Brien et al. 2007)。但在我看来,您则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巴尔特在《女神与公牛》(Balter 2005)一书中描写到,“身材细长、高高的他戴着一副眼镜,隐藏在那副眼镜背后的,其实是一个十分腼腆又缺乏安全感的灵魂。”当然,我知道巴尔特所描述的是那个父母刚刚离异的名叫霍德的孩子。而且从其它有关您的访谈录中,我看到了一个更喜欢去问问题、挑战自我、阅读哲学著作、进行理论思考的霍德教授(Hodder, Karlsson and Olsen 2008; Rogasch 2014)。我在听您讲课时,对此深有体会。我发现您非常包容他人,可以接受不同的思想。那么,您认为,您的这些性格对您后过程考古学的思想有影响吗?

伊安:我想也许是这样。尽管有人说我非常乐于和宾福德一争高下!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学习知识和改变自己的思想上,我喜欢跟能够彼此交换思想的人一起聊天、一起做研究、一起相互学习。在我看来,做学问就是要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停地向前迈进。我不喜欢在思想上固步自封,不喜欢在某一思想上停滞不前。

刘岩:您认为学者自身的知识背景会影响或限制他的学术思想吗?我们知道,路易斯·宾福德有着生物学的背景,所以他更关注生态适应。那您呢?我想您应该更复杂些,因为您在成为后过程考古学之前曾是一

位过程主义者。

伊安:是的。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了一些古典课程——拉丁文、希腊文和古代史。在欧洲的高校,考古学往往同历史学和古典研究关系密切。所以,我打下了非常深厚的人文学科背景。并且,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我获得的是一个名叫“史前史及人类环境”的学位,这个学位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古环境重建的。所以,我有着自然环境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双重背景。

刘岩:您和路易斯·宾福德关系怎么样?你们之间的交流多吗?据我所知,在1980年代末,宾福德来到剑桥大学讲学,您的学生曾经当面批评过他(Balter 2005)。从那以后,你们之间还有其他的交流吗?

伊安:是的,我们有过很多次的交往。我们曾经一起去参加学术会议,一起在会上讨论问题。他来过剑桥大学很多次,并且,当他在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新墨西哥大学教书时,我也去拜访过他并在他家里留宿。他的家坐落在乡村,而且非常漂亮,他很慷慨好客。在他家的那段日子,他像伯父般慈祥待我,非常和善,尽管我们彼此在学术上有很大分歧。但我非常尊敬他,因为他对考古学的热爱与执着。他想要弄明白考古学究竟是什么、考古学研究该要怎样做。正因如此,我非常尊敬他。尽管在我看来,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对考古学的投入与贡献是令人钦佩的。就个人来说,他对我是非常友好、和善的。

刘岩:您来到斯坦福大学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欧洲的考古学与美国的考古学之间的差别一定很大。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您是如何看待美国的科学考古学与过程考古学的?

伊安:美国考古学给我的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它太自相矛盾了。因为我来到美国后发

现,美国考古学中的考古科学相当缺乏,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我的意思是说,在英国,很多大学里的考古系都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科学家。举例来说,他们中有的人会做细致的同位素分析、有的会做微形态分析、有的则会做古DNA分析等等。很多大学的考古系里都有技术非常专业的人才,都有人专门负责从各种自然科学基金那里获得研究经费,来进行高水准的分析研究。这种情况在美国则是相对罕见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对考古学的拨款相对较少,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考古学设在了人类学系下。我非常赞同考古学家应该同文化人类学家进行学术对话,但同时在我看来,将考古学设在人类学系下并非明智之举;它限制了考古学沿着自然科学方向发展的能力。我认为,考古学应该与人类学分开,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基础设施体系,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且获得自己独立的研究经费。

刘岩:所以考古学就应该是考古学(而不是其他学科)?

伊安:是的,考古学就应当是考古学。正如大卫·克拉克所说,考古学是考古学且只能是考古学(archaeology is archaeology is archaeology)。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对。

刘岩:所以在您看来,正是因为美国考古学是设在人类学系下,而且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资助,所以才没有办法做细致的研究?这是否也解释了您之前说过的,在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他们只通过挖一点点材料就来检验假说?您的意思是否是说,如果美国的考古学能够得到足够的经费资助,就可能不会以这种更倾向于过程考古的、更人类学的方式从事研究了,对吗?在我看来,美国人类学背景下的考古学有着自身的社会背景,因为美国远没有欧洲那样厚重的历史,狩猎采集社会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或许是这些原因让美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很难同旧大陆的一样。

伊安:是的,我想这是原因中的一部分。当然,后过程考古学的思想、理论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历史考古学的影响更为深远。当涉及到对历史时期的研究时,仅仅靠环境的适应,是没有办法来解释所有问题的。但美国的考古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关狩猎采集者的,而对于这样的遗址,从人对生态因素的适应的角度就相对容易解释。

刘岩:在美国的经历让您的学术思想有所改变吗?您在《纠缠》(Entangled, Hodder 2012a)一书中非常关注运用考古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物”,这与您在美国的经历有关吗?

伊安:近年来,我试图关注美国当代考古学的主要理论趋势。举例来说,我阅读了很多关于行为考古(behavioral archaeology)、人类行为生态学(human behavioral ecology)、最优化模型(least cost optimization models)、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的著作。这些方法在欧洲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我努力学习它们、理解它们。还有新进化论(neo-evolutionary)的思想。我想我最近的文章受到了这些思想和著作的很多影响,尽管我并不赞同它们,因为它们考虑到的变量太少了。

### 第三部分 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与后过程考古学实践

刘岩:让我们谈谈您的田野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吧(如图2)。您是想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中把后过程考古学付诸实践,并探索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对吗?

伊安:是的,我们在之前的关于反身方法的讨论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刘岩:您觉得在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时所使用的的方法怎么样?您认为这些方法已经足够完美以致成熟到可以在其它遗址推广

吗?换句话说,您对自己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上所进行的后过程考古学实践满意吗?我从该遗址的田野发掘报告得知,您在实践中所使用的方法有一定的缺陷,您认为这些缺陷应该如何解决?



图2:霍德教授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

(来源: Balter 2005)

伊安: 我们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实践过程,因为你不能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去应用这些理论,你需要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现实的世界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复杂因素。我们不能对这些漠视不理。举例来说,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由于学术考古和合同考古之间的隔阂,有一些理念是很难被引入的。为了解决这一局面,我们曾做了很多努力。一些理念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被成功应用。正如我之前说过的,由于合同考古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相当严格的时间安排和非常有限的经费等因素,这些方法并没有如我预想的那样完整地得到应用。

刘岩: 您知不知道,还有哪些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使用了后过程的考古学方法?

伊安: 你的意思是哪些遗址用到了反身的方法吗?

刘岩: 是的。

伊安: 我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但据我所知,阿萨·伯格伦(Asa Berggren)将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中所使用的反身方法同瑞典合同考古中所使用的反身方法进行了对比(Berggren 2001, 2009)。英国也进行了很多反身方法的试验。还有些人认为,美国的社群考古与反身的思想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共同点。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确有很多相似的特征。

刘岩: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在我看来,后过程考古学之所以可以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得到实践,是因为这个遗址拥有很多与人类意识相关的遗物,并且拥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证据。您认为是这样吗?换句话说,您认为后过程考古学只适合那些仪式与意识遗存非常丰富的遗址吗?

伊安: 我想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当然,如果你拥有的遗存种类十分丰富,应用起来当然会更容易,并不一定非要是仪式遗存、象征符号遗存,后过程考古学方法的核心思想是要把这些不同种类的遗存证据结合起来进行阐释。我之前也说过,如果你在遗址上只发现了石器,那应用后过程方法是相当困难的,但如果你拥有各种类型的丰富信息,用后过程或反身的方法就会相对容易。

#### 第四部分 纠结理论

刘岩: 让我们来谈谈您的纠结(entangled)理论吧。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理论是在您的那本《豹的故事》(*The Leopard's Tale*, Hodder 2006)中。请问这一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促使您去发展出了这一理论呢?

伊安: 我想这一理论主要是通过发掘恰塔尔胡尤克遗址而发展出来的。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我非常惊异于一件事,那就是在那里

想要寻找物与物之间的各种物质关联是那样的容易。在我看来,有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去思考恰塔尔胡尤克,那就是将恰塔尔胡尤克看成一个由诸多人与物相互纠缠在一起而形成恰塔尔胡尤克。考古学家总是以自上而下的(from the top and looking down)的方式,通过寻找关于社会等级、不同的群体或是宗教的线索,以此来理解新石器时代。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高层次的抽象理论开始的。但鉴于人们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所能看到的信息最主要的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努力让自己的房屋屹立不倒,努力与洪水抗争,还有制造各式的泥砖、选择在哪儿畜牧。所以,对我来说,我有着非常棒的途径去接触到恰塔尔胡尤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发现,这些不同种类的实践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改变了某一样东西,其它的东西也跟着发生改变。物与物之间以一种错综复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让我觉得,或许生活中每天唯一发生着的事情,就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日常纠结。另一些宏大的主题,如社会等级、动植物驯化、社会群体、宗教等,都是这些琐碎的日常纠结的产物。我认为,正是由于恰塔尔胡尤克遗址拥有材料的丰富性,以及把这些材料拼合在一起所做的努力,才产生了纠结理论。与此同时,这一理论的产生还受到其他的理论家,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sup>13</sup>,还有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sup>14</sup>、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sup>15</sup>等人的影响。

刘岩:您在《纠结》(*Entangled*, Hodder 2012a)一书中,提到了最近社会科学中有一种思考的趋向影响了您,即“重新回到物”。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思想吗?

伊安: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理论不同,“重新回到物”这一思想倡导的是一种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理论,将人看做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或者像拉图尔(Latour 2005)所说的,将人看做是人与非人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重新回到物”主要体现了一个思想上的转变,那就是从以人为中

心,到人仅仅是诸多复杂事物关系中的一部分。同时,在我看来,“重新回到物”这一思想在当下得以流行的原因在于现如今,人们发现自己身处在很多自身没有办法掌控的大规模的过程中,例如全球气候变暖。这都不再是我们能控制的东西。城市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所以在我看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由自己建构的世界之中,但在某种程度上,人又被自己建构的世界所支配。所以,在当下,这种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非常有吸引力。新兴的数字技术也再一次让人感到自己只是宏大网络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云网络自身成为了主宰者,而人只是云网络中微小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有很多种途径可以让当下的人们感受到自己同物之间的纠结。同时,人们也察觉到这种纠结越来越不是人所能控制的。

## 下篇

刘岩:对等人类学与对等考古学(symmetrical anthropology/archaeology)(Olsen 2012)也与这些思想有关吧?

伊安:是的,对等考古学与这些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尤其是,我认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对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依附性关系(dependency),一方总是主宰着另一方(物主宰着人,或人主宰着物)。物将人牢牢拴住,而人也尝试着去驯服并主宰物。人与物之间总有一股悬而未决的张力。

刘岩: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本体论思想从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笛卡尔二元论),转向了主客体的统一(或许我们可以叫它互动论),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我们知道,笛卡尔二元论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这是一种现代思想。那么您认为,主、客体统一的互动论这一本体论或世界观与古代人的思想很相似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持这种观点的后过程考古学也

是一种进步,因为考古学家是通过模仿古代人的世界观来研究他们留下的物质遗存的。

伊安:对笛卡尔二元论的大规模反对向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毫无疑问,对小规模社会的研究是这股反对风潮的影响之一,这些社会的本体论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sup>16</sup>和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sup>17</sup>的相关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认为,开始思考非西方社会的世界观,这是一大进步,而且毫无疑问,这也是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目标。

刘岩:您认为纠结理论受到了复杂性科学的影响吗?

伊安:是的,当然。举例来说,复杂的、非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涌现的现象(emergent phenomena)以及历史特殊论都是来自复杂性科学。

刘岩:您认为就其本质而言,纠结理论在方法论上属于一种网络分析吗?

伊安:在我看来,网络分析在探索纠结理论的某些方面上很有用,并且《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将刊登一篇我与安格斯·摩尔(Angus Mol)合著的有关网络分析的文章(Hodder and Mol, 2015)。但我认为,研究人与物纠结的其它方法也是需要的,而叙事性记述(narrative accounts)或许是能够全面展现纠结的复杂性的最好方法。

刘岩:我对《纠结》一书中的图9.2这幅纠结关系图很感兴趣(如图3)。您能介绍一下这幅图是如何生成的吗?您在将人与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图示化的时候,是如何界定关系中的各个结点并将各种属性定义成变量的?

伊安:当然,在纠结以及网络的研究中,结点的界定往往非常困难。在我看来,你需要问清楚自己,这些节点与你所研究的某一种纠结的种类是否相关。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要研究有关仪式的纠结,那么一件出土自家家庭的骨镞或许就不是一个相关的结点,但如果你想研究的是动物及其产品的纠结,那么这件骨镞就可以是一个相关结点。

刘岩:您在书中说过,随着纠结在规模和复杂程度方面的增加,它变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您给出的例子是土耳其及中东地区农业的产生。这是一个大空间尺度上的问题,是一种定性的描述。那当我们在研究小尺度的问题时,如何通过图示的方式,将不同时间跨度下的纠结的规模与复杂程度进行量化比较呢?举例来说,我想用纠结理论去解释为什么某一地区的房屋式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我可能会发现,在不同阶段,纠结的复杂程度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因为各个时期考古材料的完整程度不具有可比性,不同时期的考古材料的规模与分辨率差异可能很大。某一时期的材料的分辨率很高,但另一时期的分辨率却可能很低。这无疑会降低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这也让我们很难在不同时期界定相同的结点以比较其在不同时期下的差异。有时候,房屋的结构很复杂,但我们却无法发现非常复杂的纠结。我们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伊安:你提了很多很有意思又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不同时期的纠结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的网络分析,如集中性(centrality)或者中间性(betweenness),来探索纠结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你可以在我和安格斯·摩尔合写的那篇文章中看到具体的实例(Hodder and Mol 2015)。

刘岩:你在书中认为,是纠结本身导致了变化。但在后过程考古学的早期阶段,您强调的是思想在引起事物变化时所起的重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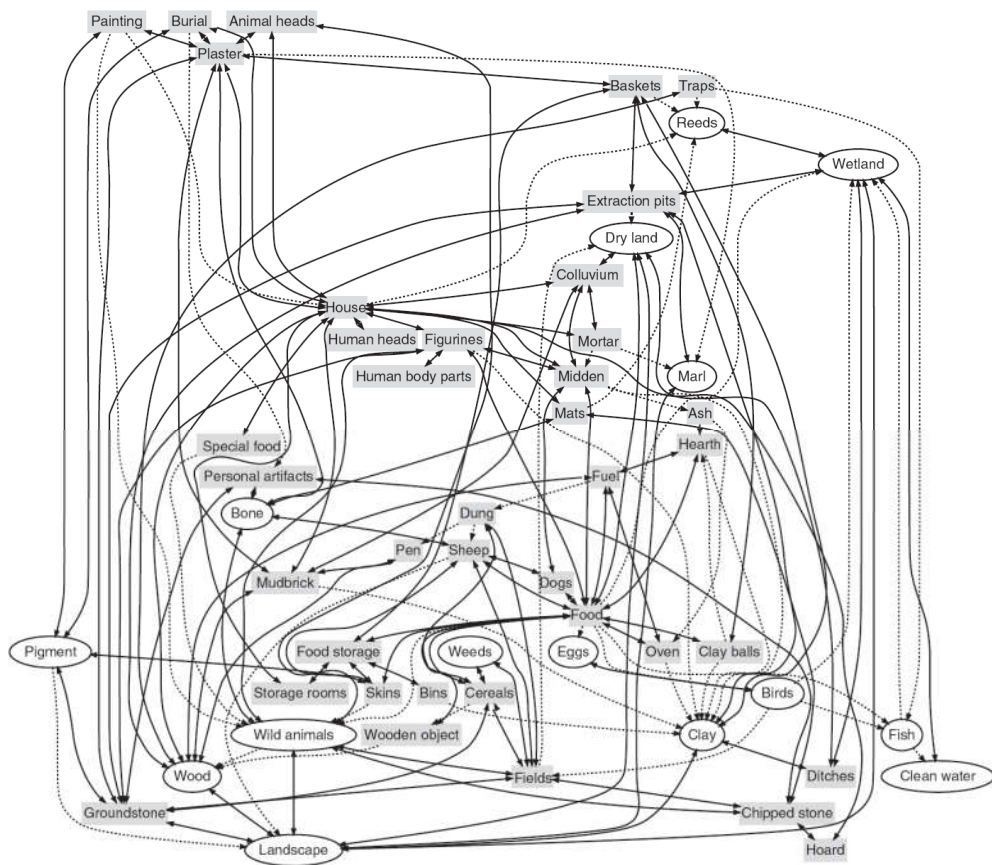


图 3: 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第一阶段的黏土纠结关系 (来源: Hodder 2012a)

用。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这说明您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吗?您认为纠结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后过程考古学的进步吗?

伊安:是的,我想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与其他理论的一种融合。早期的后过程考古学对文本与意义感兴趣,随后开始逐渐关注物质性和当下的现实世界(lived practical worlds)。纠结理论就是这样,它与其它理论一样关注着生活中的现实和物质层面,与此同时却没有否定意识与思想的领域。

刘岩:有人说纠结理论是对包括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在内的各种理论的整合。您同意这一看法吗?当代考古学是否打破了不同范式之间的界限,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的界限是否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呢?

伊安:我同意你的看法,纠结理论是对不同

理论的整合,当代考古学也正试图打破不同范式的界线。

刘岩:您有计划对《纠结》一书进行再版,并完善纠结这一方法吗?

伊安:是的,我正在写第二本有关纠结理论的书,主要是想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并尝试着探索新的领域。纠结理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能否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来解决纠结的复杂性。我认为,纠结理论依赖于考古材料的丰富与完整程度,如果考古材料足够好,纠结理论的缺陷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 第五部分:考古学的多样性:中国考古与世界考古

刘岩:让我们聊一聊更宏观的一些问题吧。

您是如何评价当代世界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现状的?您认为是存在着某种主流的范式还是呈现出多元的态势?

伊安:我想,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受后过程考古学影响的方法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美国,考古学又回到了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的以及行为考古的方法。但是近年来,不同(地区)的考古学理论在不断地取长补短,呈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并不存在一个主流的范式,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范式去发展自己的观点,并且不会局限在过程或是后过程的考古阵营。

刘岩: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当代考古学理论》(*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Hodder 2012b)这本书吧。您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中是如何选择理论词条的呢?您如何觉得这些理论能代表当代考古学理论的趋势呢?您是如何平衡理论的多样性与主流理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伊安:我必须承认做这些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今天再让我编撰这本书,我可能会选择截然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考古学的整体格局总是在不断变化,并且总是和新型科技相对话,如同位素研究、古DNA分析和贝叶斯统计。

刘岩:我们知道,您的这本理论著作在2012年出版了第二版。这一版中的您在内容上做了很多改动<sup>18</sup>。您是怎样觉察到近些年的理论发展的?您都发现了什么?而在这两版中,主要的理论都是与后过程考古学有关的。这是不是说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更为丰富了?或者说过程考古学不如后过程考古学那样关注理论?过程考古学主要关注的是方法论吗?

伊安: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再让我编写第三版,结果也将会截然不同。当我在编写第

二版的时候,我以为我所选的主题代表了西方英语国家考古学的主流趋向。但我之前也说过的,最近美国考古学对进化论的关注有所增加,如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再出新版时,我也会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刘岩:《当代考古学理论》一书两版的时间间隔相差10年。您认为从第二版到第三版期间的间隔时间会更短一些吗?因为我觉得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很多流行的理论很快就成为了明日黄花。

伊安:我同意你的看法。理论的发展的步伐的确是在呈加速度的状态在发展。但年轻的学者也很有必要为编写这样的一部著作贡献一份力量啊!

刘岩:让我们来聊一聊考古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吧。您认为考古学的社会职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布鲁斯·特里格将考古学分成了民族主义考古、帝国主义考古和殖民主义考古(Trigger 1984),那么,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考古学的社会职能有所差异吗?

伊安:尽管考古学多样性有所增多,后殖民地考古、社群考古还有本土考古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全球范围的考古学来讲,无政府背景下的考古也有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展,但特里格的贡献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像中东地区文化遗产的破坏,在这种状况下,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还有在冲突过后,南非和卢旺达也开始重视文化遗产。

刘岩: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所以民族主义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考古学。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都是中国考古学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中国,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被列为国家项目,国家给予资金的支持。在您看来,民族主义下的考古学实践起

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伊安：将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相联系这一做法曾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少数民族的边缘化，也会抹去他们的历史和史前史。我希望中国考古不要落入这样的圈套。

刘岩：在您看来，考古学的作用是什么？是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还是能够参与到当地事务中并丰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或是怎样？

伊安：我认为，考古学的终极目标、也是基本目标，是让人去探索人类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刘岩：您认为科学考古与人文考古这样的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持续下去吗？

伊安：这两者或许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差异，很难完全消除。而且，我也不认为消除它们的差异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或许，让它们相互批判、相互监督是必要的。在我看来，将科学过于普遍化以及过度关注内在的特殊性（inward-looking specificity）都是相当危险的。

刘岩：您在2012年曾来中国讲学，中国考古学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如图4)？

伊安：我来过中国两次，中国真的让我印象深刻。的确，中国的考古遗址太棒了，文化遗产的丰富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我同样对中国考古工作的范围、田野发掘的规模以及非常周密的方法印象深刻。同时，国家博物馆和各个地区的博物馆，以及中国对考古学和文化遗产所投入的大量资金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图4：霍德教授2012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来源：中国考古网）

刘岩：我想，您应该会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中国考古的一些状况。中国考古学特别关注材料，认为任何结论的得出都必须以考古材料为基础。这或许与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有关系。在20世纪早期，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继承了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sup>19</sup>的思想，对考古材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成为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传统（陈洪波，2011）。考古学也被设置在历史学科之下。之后，文化历史考古学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范式。因此，中国考古学家习惯从考古材料中得出观点，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换言之，中国考古学家习惯归纳法而不是假说-演绎法。所以，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科学的方法非常乐于接受，但对理论性思考比较抵触。您认为这也是世界考古学多样性的一种表现吗？您对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状况有什么感想呢？

伊安：我经常说考古学应该同历史学紧密相连，我们应该去使用情境的方法，并以对考古遗址出土材料的深思熟虑为基础。所以，我很高兴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在中国考古学身上得以体现了。但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并没有在“社会与文化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这一国际性课题上作出太多的贡献，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和羞愧的事。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丰富的文化序列将会帮助全世界其它地区的考古学家们对很多问题

有更深入的理解,如农业适应、城市化、人口迁徙,以及一些理论问题,如纠结、物质性及本体论等。而且,中国早期文化的独特性质将会让全球的考古学家更好地理解人类是如何以各种方式构建自己的生活及生存环境的。

刘岩:您认为中国考古学有哪些不足之处?在您心中,中国考古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考古学怎样才能取得进步?

伊安:其实,我并不觉得我对中国考古学的了解程度已经到了可以给出一些批评性建议的地步——我更愿意从中国考古学中学到更多。总体上,我唯一的批评性建议就是刚才说过的,如果中国考古学家无法参与到世界考古学的理论讨论之中,那太让人遗憾了,也将是世界考古学的损失。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考古学家到国外参与发掘。这也将有助于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进行思想交流与经验交流。

刘岩:您有再来中国的计划吗?

伊安:我很想去,但近来还没有出访的计划。

刘岩:假设您将要给一所中国大学的考古系研究生讲授一门课程,您想给他们讲些什么?后过程考古学,纠结理论,当代考古学理论,还是恰塔尔胡尤克遗址呢?

伊安:所有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我最想做的是让同学们参与到我新提出的纠结理论中,并让大家看看,这一理论是怎样用来解释诸如农业起源这类重要事件的。

刘岩:您认为,如果中国开始实践后过程考古学,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伊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找到能够让考古学与社会相关联的方法,让当地的群体参与

到考古发掘中来,去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可以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看看中国考古学是怎样融入并且参与到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去的,我想这将会是一个十分让人期待的进步。这样,中国考古学的视角将会同西方的迥然不同。如果某种考古学理论是以中国的社会及历史理论、而不是以西方的理论为基础,那将多么令人兴奋啊!

刘岩:最后,您能展望一下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研究的未来吗?您认为未来的考古学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伊安:如今的西方考古学越来越关注“大数据”,重视对数据的积累,并运用现代的分析技术去理解长时段、大尺度的趋势。当然,西方考古学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积累了海量的材料,现在是到了该从这些材料中探索些规律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将这些材料同古DNA分析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么,我想这将开启一个令人激动的考古学新纪元。关于文化遗产方面,谁可以拥有、掌控文化遗产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文化遗产旅游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收益来源。越来越多的人把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看作一个可以摆脱贫困的朝阳产业。我把这个看作是考古学当今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考古学能否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几个世纪以来,考古学扮演的都是不起眼的旁观者的角色。它的作用微不足道。如今,很多社会群体和国家都将考古学及文化遗产看作是推进现代化、增加收入、战胜贫困以及摆脱边缘化的一种途径。我希望考古学能够不负众望做到这些,在社会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刘岩:谢谢您,霍德教授。欢迎您有机会再次来中国。

## 参考文献

- Balter, M., 2005, *The Goddess and the Bull: Çatalhöyük: An Archaeological Journey to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Berggren, A., 2001, Swedish Archaeology in Perspectiv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flexivity, *Current Swedish Archaeology*, Vol. 9, 2001: 9-24.
- Berggren, A., 2009, Evaluation of a Reflexive Attempt: The Citytunnel Project in Retrospect, *Archaeological Review from Cambridge*, Vol.24.1, 2009: 23-37.
- Berggren, A., et al., 2015, *Revisiting Reflexive Archaeology at Çatalhöyük: Integrating Digital and 3D Technologies at The Trowels Edge*, *Antiquity*, 89, 2015: 433 - 448.
- Binford, L., and Renfrew, C., 1987, *An Interview with Lewis Binford*,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1987: 683-694. 路易斯·宾福德, 科林·伦福儒:《路易斯宾福德教授访谈》, 陈胜前译,《南方文物》, 2011年第4期。
- Binford, L., and Sabloff, P., 1998, *Conversations with Lewis Binford: Drafting the New Archaeolog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Binford, L., 2002, *In Pursuit of the Past: Decod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 陈胜前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 Hodder, I., and Orton, O., 1976, *Spatial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der, I., 1982a, *Symbols in Actio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Materi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der, I. (ed), 1982b,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der, I., 1982c, *The Present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s*, London: B. T. Bastford Ltd.
- Hodder, I., and Hutson, S., 1986,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The First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der, I.(ed), 2000,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 Çatalhöyük*,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Monograph.
- Hodder, I., and Hutson, S., 2003,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The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伊恩·霍德, 司各特·哈特森:《阅读过去》, 徐坚译, 长沙:岳麓书社, 2005年。
- Hodder, I., 2006, *The Leopard'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 Çatalhöyü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Hodder, I., Karlsson, H., and Olsen, B., 2008, 40 Years of Theoretical Engagement: A Conversation with Ian Hodder,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Vol. 41, No. 1, 2008: 26-42.
- Hodder, I., 2012a,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ings*,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 Hodder, I.(ed), 2012b,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Th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odder, I.(ed), 2014, *Integrating Çatalhöyük: Themes from the 2000-2008 Seasons*,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 Hodder, I., and Mol, A., 2015, Network Analysis and Entanglemen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15, published online, 26 August, 2015.
- Hodder, I., and Marciniak, A. (eds), 2015,

- Assembling Çatalhöyük*, London: Maney Publishing.
- Johnson, M., 1999,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魏俊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 Knappett, 2012, Materiality, In: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Th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188-207.
- Latour, B., and Woolgar, S., 1986,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D., and Tilley, C. (eds), 1984,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M., et al., 2007, *Archaeology as a Process: Processualism and Its Progeny*, Salk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Olsen, O., 2012, Symmetrical Archaeology, In: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Th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208-228.
- Rogasch, J., 2014, Cross Boundaries and Remain Questioning: An Interview with Ian Hodder, *Dig It: Journal of the Flinders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ume 2, Issue 2, 2014: 108-109.
- Thoreau, H., 1910, *Walde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O.
- Trigger, B., 1984, Alternative Archaeologies: Nationalist, Colonialist, Imperialist, *Man*, New Series, Vol. 19, No. 3 (Sep., 1984), pp. 355-370.
- Trigger, B., 2006,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后 记

采访者按:当某种陌生的事物还没有被人所接受和熟知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觉得它高深莫测,遥不可及。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近距离地感知它、接触它,就会发现之前的神秘感原来只是一种无知状态下的恐惧与偏见。我对后过程考古学的认识过程就大抵是这样的。隔岸观火不如身临其境。经过旁听霍德教授的课程以及同他的交流,我了解到了一个更为形象、更为真实的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给人的感觉一直很神秘、很抽象、并且非常理论化。而实际上,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的正是人的本质,人的社会性,是真正意义上的“透物见人”。与动物不同,人的本质在于人具有思想、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一方面,人的生产、生活依赖于物质、依赖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会以物质、以自然为媒介,主动构建社会关系、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因此,在理论上,后过程考古学以丰富的社会理论为依托,秉承着主、客体统一的观点。在方法与实践上,反身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反思研究中的偏见,并让更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立场的人,包括遗址所在地的群众参与到学者的研究之中。并且,后过程考古学更具现实关怀,它试图参与到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让考古学更具社会性与现实性。与之前的看法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同过程考古学相比,实际上更依赖考古材料,它对材料质量与分辨率的要求更高。因此,后过程考古学更需要考古科学的参与与多学科研究的辅助,以从考古材料中提取更多的信息。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霍德教授广博的知识背景,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底,还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与探索、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包容的学术态度都是值得每一位考古人学习的。在如何发展中

国的考古学理论上,霍德教授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国自身的社会与历史理论中汲取营养,将中国考古学建立在中国的社会理论之上,而不是一直跟在西方理论的后边。因此我想,中国考古学首先要更加严谨且规范地获取考古材料,对考古材料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其次,要对理论做更多的探索,学习、理解西方理论的同时取长补短,使之更契合中国考古学自身的社会背景;还要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中,对世界考古学献出一份力;还要注意避免走向相对主义,保持研究的科学性,限制主观性。上述仅是我自己在做完这次采访之后的一点拙见,用反身方法的观点来看,这些建议也是需要在实践中、在互动中不断进行反思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想,中国考古学需要的正是多元的话语,大家共同献言献策,百家争鸣,才能推动中国考古学的不断进步。

## 注 释

<sup>1</sup>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1954-):英国人类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当代物质文化、人与物的关系、消费关系等。著作颇丰,主要有:《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1987)、《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1998)、《东西》(*Stuff*)(2010)等。

<sup>2</sup> 迈克尔·尚克斯(Michael Shanks)(1959-):英国考古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古典考古及考古学理论。主要著作有:《重建考古学》(*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1987)、《社会理论与考古学》(*Social Theory and Archaeology*)(1987)、《剧场/考古学》(*Theatre/Archaeology*)(2001)、《考古学的想象力》(*The Archaeological Imagination*)(2012)等。

<sup>3</sup> 克里斯·蒂利(Chris Tilley):英国考古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要贡献为将景观的方法引入到考古学中,开创了景观考古学。主要著作有:《景观现象学:地点、路径与纪念性建筑》(*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1997)、《巨石阵的物质性:景观现象学的探索》(*The Materiality of Stone: Explorations in Landscape Phenomenology*)(2004)。

<sup>4</sup> 亨利艾娜·摩尔(Henrietta Moore)(1957-):英国女权主义社会人类学家,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主任。主要研究兴趣为全球化、性别、社会转型及自我想象与民主政治决策的关系等。主要著作:《空间、文本与性别:肯尼亚马拉科维特部落的人类学研究》(*Space, Text and Gender: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Marakwet of Kenya*)(1983)、《女权主义人类学》(*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1988)等。

<sup>5</sup> 麦克·帕克·皮尔逊(Mike Parker Pearson)(1957-):英国考古学家,现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史前巨石阵、墓葬考古等。主要著作有:《不列颠青铜时代》(*Bronze Age Britain*)(1993)、《死亡与墓葬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Death and Burial*)(1999)等。

<sup>6</sup>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创立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概念,如惯习(*habitus*)、场域(*field*)、象征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等。其中,后过程考古学的很多概念如能动性(*agency*)、实践(*practice*)、反身性(*reflexive*)等都是受到布迪厄的影响。代表著作有《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法文版书名为*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1984)、《反思社会学的邀请》(*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等(中译本名为《实践与反思》)(1992)。

<sup>7</sup>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社会学家,以“结构化理论”影响力最大,认为社会结构不仅制约着个人的行动,而且还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个人的行动既维持着社会结构,又改变着社会结构,这一理论也影响到了后过程考古学。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阐释社会学的积极批判》(*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1976)、《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1986)等。

<sup>8</sup> 埃德温·阿登纳(Edwin Ardener)(1927-1987):英国社会考古学家,主要贡献是对性别的研究。他提出了女性是“静默的群体”这一理论,认为女性的声音之所以没有被听见,是因为统治阶级对他们的声音听而未闻,他发现,人类学研究中了对女性的忽视,而且民族志研究也是由男性设计的,他们对自身的偏见毫无觉察。

<sup>9</sup>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理论家,主要思想为权力及其与知识的关系。主要作品有:《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

<sup>10</sup> 霍德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系列田野报告集中的一本里列出了有关反身方法的12条探索性策略(Hodder 2000)。现将其列出,以供读者对反身的方法作进一步了解:

a.在发掘过程中,每一、两天,实验室分析人员要到访遗址发掘区了解发掘情况。

b.虽然很多考古方法都附带承认了考古材料本身也带有理论色彩(*theory-ladenness*),但这些方法都假设考古材料是客观且严肃的。

c.很多考古学方法还有一个特征,它们都假定考古材料具有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性质。

d.实验室分析人员到访遗址发掘区的另一个目的,

是要尽可能快地将自己的分析结果反馈给田野发掘人员。

e. 一个整合的、可以流动共享的数据库,是将考古项目中不同的参与者联系在一起的最根本途径。

f. 用视频对考古发掘过程进行记录,同样可以达到反思的目的。

g. 为了达到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目的,人们需要在理论意识(theoretical awareness)上投入大量精力。

h. 考古学家需亲自绘制自己发掘建筑的平面图(plan)、素描图(drawing)、模型图。

i. 在恰塔尔胡克遗址,我们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队过来发掘,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发掘区域。

除此之外,霍德还在报告中列出了恰塔尔胡克遗址有关反身方法的四个主题(Hodder 2000)。

a. 反身性(reflexivity)。反身性的意思是对考古学假说的结果以及不同群体(包括其他考古学家及非考古学群体)参与到考古学过程的行为进行反思。

b. 关联性(relationality)与背景性(contextuality)。意思是试图将考古发现知识产生的特定背景相联系。

c. 互动性(interactivity)。意思是在人们进行考古学阐释的过程中,要为人们提供可以对阐释进行质疑和批判的途径。

d. 多元话语性(multivocality)。意思是不同的群体对过去的兴趣往往是相冲突的,他们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考古学中,所以需要为不同话语的产生提供途径。

总之,我们可以将反身方法形容为一种可以打破并质疑分类、界线的非二元论式(non-dichotomous)的思想(Hodder 2000)。

实际上,后过程考古学中的反身方法,与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反身性(reflexivity)思想十分接近。布迪厄的反身性思想认为,社会学家在做研究时,要不断反思自己所持有的视角、研究的内在逻辑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可能对事实真相造成扭曲并产生偏见。所以“反身性”又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对自己所做研究的反思。

<sup>11</sup> 在后现代的社会中,由于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战争等社会问题,导致人们对现代科学开始持消极的态度,并且开始批判现代性思想。如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斯宾格勒(Spengler)的经典名著《西方的没落》等。

<sup>12</sup> 罗宾·柯林伍德(Robin Collingwood)(1889-1943):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业余画家,倡导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有所贡献。主要著作有:《自传》(Autobiography)(1939)、《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1945)、《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1946)等。

<sup>13</sup>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主要兴趣点为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的主要倡导者之一。ANT理论认为,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没有中心,没有主、客体对立,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承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主要著作有:《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86)、《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3)等。

<sup>14</sup> 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1955-):英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令现代性发生的殖民地社会,中东地区的物质与技术政治等。现阶段主要研究政治同物质与技术联系的方式。主要作品有:《殖民埃及》(Colonising Egypt)(1991)、《现代性的问题》(Questions of Modernity)(2000)等。

<sup>15</sup> 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1960-):澳大利亚人类学家,现为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主要研究太平洋地区自被欧洲殖民以来的历史与艺术。主要著作有:《纠缠的实物》(Entangled Objects)(1991)、《南太平洋群岛:视觉、人工制品、历史》(Oceania: Visions, Artifacts, Histories)(1997)、《发现:库克船长的航行》(Discoveries: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2003)等。

<sup>16</sup>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1951-):巴西人类学家。主要作品有:《从敌人的视角:一个亚马逊社会的人性与其神性》(From the Enemy's Point of View: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an Amazonian Society)(1992)、《亚马逊:民族学与当地历史》(Amazônia: etnologia e história indígena)(1993)等。

<sup>17</sup> 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1949-):法国人类学家,曾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列·斯特劳斯,主要研究亚马逊地区的土著群体。主要著作有:《微光的长矛:亚马逊丛林中的生与死》(The Spears of Twilight: Life and Death in the Amazon Jungle)(1996)等。

<sup>18</sup> 新的变化和新增加的条目包括:达尔文文化进化;人类行为生态学(human behavior ecology);复杂系统与考古学;物质性;对称考古学;遗产;后殖民地考古学(post-colonial archaeology);本土考古学(indigenous archaeology)。

<sup>19</sup>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学派创始人,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要以客观的态度撰写历史。强调客观材料的使用,认为“历史要书写得要像过去发生之事一样真实”。